我和《前进》报

1955届 高三3班 胡双宝

1951年9月，学校从鼓楼宝钞胡同搬到圆明园。不久，步入正轨，正常上课。不过，修路、修操场等等建校劳动较多。有时在劳动的第二天，南楼外东南便有一块黑板，报道头天劳动的好人好事，记得还有表扬发扬“班际主义”、“组际主义”之类的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办的，谁写的稿。这样的黑板报，在活跃学校生活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只是以后不见了它的踪影。

1952年暑假以后，团总支（不久改为团委）改选，让我担任宣传委员。熟悉我的老师、同学都晓得，我一口山西话，还有点口吃，浑身上下实在没有几个适合搞宣传工作的细胞。直到现在，还是开会很少发言，尤其是不跟人争论。比较重要的会，而且有“话”想说，就是事先把要点和例证刻一张蜡纸，油印发给大家，或是写好稿子请人代读；上课也常发这样的“传单”。那时候并不懂得“宣传”二字的确切含义，只知道跟鼓动有关，要把好的、正确的东西告诉大家。

团总支书记路开老师对我说过几次办黑板报的事，我考虑过，也试着出过几回，可内容、形式都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这年元旦前夕，教导主任江山野老师在南楼东门外一块黑板上写了几句向全校同学祝贺新年的话，下署党总支、教导处、工会、团总支。这件打动人心的事颇为新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还记得祝词的全文。

上高二这一年（1953—1954学年）我把比较多的时间花在团的工作上，用于改进黑板报占了其中大部分，我给这个无名黑板报起了个名字：前进。赋予它的含义是：青年，尤其是有志有为的青年，应当永远向前，如同《义勇军进行曲》结尾唱的“前进！前进！进！”刊期也从不定期改为每周1期，后来又改为每周2期；每期由1块黑板到2块，有时还出4块。

黑板报要引人注意，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既要注重内容，也讲究形式，我于后者，全然无能力，却得到许多同学的支持。抄写、报友、花边、插画等，校美术班翟树成、李问汉、任润生、严重五等和其他一些现在想不起名字的同学出力不少。他们常常中午不休息，或者放弃课外活动，有时候是星期天早点回校。

1954年暑假起，我调出专做团的工作。虽然抓“全面”了，可《前进》报仍然是我的主要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仍然是兴奋点之所在。所谓“抓”主要不体现在订计划什么的。团的工作，尤其是宣传工作，主要是起配合作用。所以，我的“抓”，就是注意攫取生活中的苗头、新鲜事物，及时组稿，约人写，自己也写。

专做团的工作以后，了解的情况多了，跟老师接触、联系的机会多了，从老师那里，特别是各位班主任老师那里，听到同学的各种情况，也从班、团、队干部当中听到许多情况。我还跟许多低年级同学比较熟，他们有什么想法、看法也经常告诉我。我刚从同学当中出来，跟他们没有隔阂，他们也还把我当同学，了解到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些情况当中，有各种各样好的、积极向上的因素、苗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并且应当加以引导的问题。《前进》报的许多题目就是来自这些情况。因为《前进》报反映的是同学关心的事，每期出来，都有许多同学围着看，有时也引起议论。

对于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般是写一二百字的评论，善意地加以引导，我记不起用过什么简单化的批评字眼。我经常设身处地地考虑，什么样语言容易被接受，而少逆反心理。——这种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一直延续至今。这类评论，大多由我写。这种形式跟班主任老师和班上干部做工作的方式不同，却可以为他们创造条件，而不是麻烦。

《前进》报还有一个作用：引导各班办起壁报，并且办好。《前进》报上有一个不定期的栏目：各班壁报巡礼。或者综合有关情况加以评述，或者专门介绍某班的某期壁报。我每周都要到各班“串”一回，浏览壁报内容。综述稿自然是由我写。

《前进》报的内容是严肃的，形式是活泼多样的。除了一般文章，《前进》报上有诗，有歌曲（发表过施光南创作的一首），有小说（比小小说还要小），也发表过三场话剧剧本（全剧二三百字）和漫画，还译载过苏联《少年先锋》报上的小品等。

我喜欢《前进》报，上了北大以后，还经常回校看它。从1949年初在河北平山中直机关文化补习学校办建团黑板报，到办《前进》报，到后来正式从事编辑工作至今，我已有48年的“编龄”了。

胡双宝，男，1947年5月参加革命，1949年至1954年在北京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学习，后在校工作两年，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1958年调出从事行政、教学工作。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文水方言志》、《汉语·汉字·汉文化》等。上文，原载1997年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难忘的岁月》。